

移民岁月 第十六期  
YI MIN SUI YUE

# “三西”建设时期的吊庄移民开发(二)

刘天明

## 吊庄移民开发的基本类型

按照吊庄移民迁移的地域来划分,可划分为县内吊庄移民开发、县外吊庄移民开发两种。

首先来看看县内吊庄移民开发。在贫困县内的平川上,兴修水利工程,开垦荒地,用黄河水资源灌溉农田,从干旱缺水的困难地区迁移安置移民开发生产。其优点是隶属关系不变,易于组织协调。迁居距离近,是乡与乡之间的迁移,难度小,建设速度快,费用低,效益好,移民适应性强,绝大多数移民均能当年迁移,当年见效,两三年解决温饱。缺点是土地面积小,潜力不大,移民安置容量小,数量有限。另外,转移人口仍以种植业为主,劳务输出、乡镇企业发展缓慢,使开发地后劲不足。到1996年年底,共有6处县内移民开发区:同心县的河东、河西,海原县的兴隆、高崖、李旺,固原县的七营,共搬迁安置移民6.87万人,开发土地万亩,其中90%的农户已稳定解决了温饱,40%的农

户人均产粮达到500公斤,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。如1983年开发建设,1988年建成的同心县河西、河东移民吊庄基地,由于科技投入大,起点高,发挥效益快,粮食亩产由开发之初的115公斤,提高到368.9公斤,人均占有粮食573公斤。

再来看看县外吊庄移民开发。利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将宁南山区一些生产、生活条件极端贫困的农民跨地区的迁往引黄灌区,进行农业生产开发。其优点是长远效益好,能够规划整治国土,安置移民数量多,并可按照移民开发地所处的周边环境,因地制宜,进行深度综合开发。缺点是距离远,搬迁费用多,难度较大,移民刚到迁入地时,各方面不习惯,容易产生动摇情绪。到1995年,共建县外移民开发地15处,它们是隆德县迁出的隆湖吊庄,泾源县搬迁的芦草洼吊庄,固原县搬迁的中宁县大战场、长山头,吴忠的扁担沟,彭阳县搬迁的中卫县马家梁,盐池县搬迁的灵武狼皮子梁、青铜峡市干城子,海原县搬迁的月牙湖、五堆子、三棵柳和灵武县的白土岗

子、贺兰县的南梁台子、永宁县的玉泉营,西吉县搬迁的中卫南山台子。

按照吊庄移民安置的方式来划分,可以划分为集中安置式的移民开发和分散安置式的移民开发。

集中安置式移民开发是建立移民开发基地,集中安置移民,即搬迁时将整个自然村安置在同一个开发区内,并沿用迁出地名称,如固原县迁到中宁县的开发基地,其名称仍为大战场乡,迁到此处的村子的名字仍为锅底坑村等。其优点是,移民大多相识,人际关系密切,保持原有的社会心理、文化交流、生活习惯等,移民容易接受。

缺点是移民都是来自贫困地方的穷人,资金匮乏,对新的环境,新的生产技术缺乏了解,搬迁后第一年的生活、生产困难大,办法少。采取这种移民开发方式的有隆德县搬迁的隆湖吊庄,泾源县搬迁的芦草洼吊庄,固原县搬迁的中宁县大战场乡,彭阳县搬迁的中卫县马家梁,盐池县搬迁的灵武狼皮子梁,海原县搬迁的陶乐县月

牙湖等9处。吊庄规划总面积50.4万亩,计划开发配套面积28.54万亩,到1994年年底,已开发配套土地22.66万亩,搬迁安置移民90061人。

分散安置式移民开发,又称插花式移民开发,由迁出县和迁入县联办,共同组织移民进行开发建设,即在灌区已开发但缺人经营的地方,划出若干定点村,安置山区移民。投资由迁出县掌握,负责平田、建房等,给搬迁户每人两亩耕地,每户两间房,一口水窖。迁出县在两年内负责搬迁并安排搬迁群众当年的生活和种子、肥料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,两年后搬迁群众生产、生活走上正轨,并能自理和自给,即交由迁入县管理。这种方式的优点是,可以利用原有的生产生活设施,投资少,移民可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,容易克服各种困难。目前,采取这种移民开发方式的有,西吉县迁往中卫县的南山台子,海原县迁往陶乐镇的五堆子、三棵柳和灵武的白土岗子,彭阳县迁往中宁县的长山头,盐池县迁往青铜峡市的干城子5处。

# 喜欢搞发明的广播人——尹志华(二)

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

到宁夏电台筹备处报到后,刘亚民给我们大概介绍了筹建情况,那可真是筹备,几乎是什么设备也没有,唯一的设备是一台德国的老D型录音机,是个宝贝,光杆一台录音机再好也是什么也干不成。

来宁夏前想得最多的是会遇到什么设备和工作环境,生活方面几乎没有考虑,那时候艰苦也光荣。在火车上我们还说要是先看到全套的技术图纸就好了,但到了后才知道要白手起家,很多设备都是靠我们去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伸手求支援。

我们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去修解放大街。当时银川连个县城都不如,城里还有很多排水沟和大芦苇坑。修马路、拉土方、填水坑。

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道了宁夏的情况后,把一台旧的发射机送给宁夏,一千瓦的发射机,拉到银川后没有发射铁塔,就在公园附近一个空地上立起一个大木杆调试。尽管工作条件很差,生活很苦,但工作热情很高,第一次从立起的大木杆上接收到了无线电波信号时,那个高兴劲儿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。

自治区成立时我们去火车站中央代表团,团长是林伯渠,中央代表让我们搞个录音报道,台里希望的沙荻、耿长庚和我

3人去。

录音报道只有现场录音还不行,还必须把现场采集的声音再编辑成播出带才能播出。当时台里只有一台录音机,根本无法编辑,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困难,最难办的是怎么把录音报道素材送到北京。那时候还没有专业的传输线路,领导还说:“你们先把现场录下来,实在不行再把录音带送到火车上,请中央台的人到北京站接车,让他们再编辑播出,这样的话就耽误很多时间,当时火车到北京要两天的时间。”

在大家做准备工作时,我突然想起电话线也可以传送录音素材,就向刘亚民汇报,他听后马上与邮电部门联系,一试试真的行,最后就是通过电话线把录音素材传到北京,他们接收后再编辑,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宁夏台的录音报道。这次报道还受到了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领导的表扬。那也是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通过电话线传送录音素材,这个技术通道打通后,后来很多报道都是这样传送。中央台采用宁夏台的录音报道也开始了上来。

我印象深的还有一次是跟沙荻去青铜峡水库建设工地采访。当时水库完成了对黄河的截流,影响很少。那个冬天,黄河来水量较少。沙荻是记者,

我给他提供录音技术保障。沙荻真是个好同志,不怕吃苦,思维敏捷,那天风特别大,录音采访时他怕风对音质有影响,就用身体挡住了上风头,我怕录音机里进了沙子,还把大衣脱下来,盖在机器上,那时候对机器的爱护真的像爱护自己的眼睛,没人计较得失,思想都很纯洁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电台的各项工作基本上进入了有序阶段。但工作中的配合还是经常出现问题,最早的电台是直播,全国都一样,后来出了几件事,影响很大,你想,播音员也是人,难免会出错,都是手写的稿件,字稍微潦草点,就可能让播音员吃字或打疙瘩(口吃),中央台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笑话,如有个新闻稿是:“把毛主席著作送下乡”,可播音员播的时候出错了,把著作两个字“吃掉”,说成是:“把毛主席送下乡”,还有的新闻稿中写的是:“苦干实干加巧干,播出时成了苦干实干加二十五干,把巧字读成了二十五,这样的事情挺多的。

后来上边出了个规定,新闻稿件必须录播,先录好声音,再播出。可是一录播,工作量就增加了一倍还多,技术保障工作量增加很大,还有播音员与技术人员配合问题。播音员是在播音间工作,密闭的,录音

员是在隔壁的房间操作,是两个房间,相互之间说话听不见,全是通过中间的一个玻璃窗打手势,经常有播音员在里边播了,外边的录音机没开,或是录音机开了,里边没准备好,步调不一致,有时候稿子来的晚,要赶播出,大家都急,天天吵架,工作矛盾很大。

后来我想,能不能搞个遥控操作平台,录音机还在外边,但遥控开关在播音员手边,播音员准备好了自己开机,出现错误或想重录一遍也是播音员操作。

这样就可以解决两个人操作不协调的问题。那时候领导也支持技术革新,我和周广政等几个技术骨干一商量,都认为可行,大家先汇总技术方案,我出图纸,那时候家里穷,连个桌子上也没有,晚上就趴在缝纫机上画图纸,制作时只能晚上加班,因为白天要播出,机房不能动,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遥控操作平台成功了,一下子解决了困扰好几年各部门的技术问题,值班编辑不烦燥了、播音员不烦闷了、录音员不烦恼了、质量还提高了,效果特别的好,当时的领导还跟我们说:“你们这一项革新提高了质量又解决了三方面的烦恼和协调。”

(尹志华口述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)

# 将台堡:长征路上的“聚将台”



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。

提起红军会师,大多数人都知道会师会师,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将台堡会师。将台堡在固原市西吉县。1936年10月22日,中国工农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。记者一行到达将台堡时正值中午,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市,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堡出现在面前,门楣上镶嵌着“将台堡”三个大字。在长征路上,曾有一批名将在这里相聚,然后又从这里出发,最终夺取了胜利。

## 千年古堡成了红色遗址

将台堡位于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莲川河交汇处,距县城30公里,两河交汇形成三角埠坪,地势平坦开阔。相传为宋代驻兵的堡垒,更是宋将穆桂英的点将台。1920年海原大地震,将台堡遭到损毁,现在人们看到的将台堡是在原址上缩小重建的。

1936年10月22日上午,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军团终于到达甘肃静宁县将台堡(今属宁夏西吉县),与前来迎接的一军团二师胜利会师。六军团于23日到达兴隆镇,与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。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记得,那天下午,他们正在行军,意外地发现了一名红军骑兵,原来是一方面军的侦察员,就给他们带路,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,与前来迎接他们的一军团二师五团会合。

当时,黄新廷骑在马上,正思考着问题,没有注意看前边,忽听卢冬生师长喊道:“快下马!”他一下子回过神来,赶忙跳下马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相会。战友们久别重逢,高兴得热泪盈眶,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:“我们胜利会师了!”热烈地拥抱、欢呼,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。那种感情,真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的。23日,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到达将台堡以南的兴隆镇,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,至此,红军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三大主力红军实现大会师。其后,会师官兵一万多人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会师联欢。

将台堡会师在长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在这里相聚,然后又从这里出发,最终夺取了胜利。

贺龙、聂荣臻、刘伯承、任弼时、肖克、关向应、左权……正是这些响亮的名字让“将台堡”得以名副其实。

记者一行到达将台堡时,正是一个中午,恰逢镇上的集市,街道上熙熙攘攘,人声鼎沸。

将台堡位于镇子中间,现在是红军会师纪念馆。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堡,保存的相当完整,堡门在正南面,其上镶嵌着“将台堡”三个大字。在古堡的映衬下,前方的红军会师纪念碑庄严非常。纪念馆内,正好遇到馆长张玉忠,他说纪念馆在古堡内,还有红军指挥部旧址。纪念碑坐落在将台堡内东侧,碑高22.5米,碑的正面镌刻着江泽民同志题写的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”1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,背面是中共西吉县委和政府撰写的碑文,碑的顶部雕有三尊红军头像,象征红军三大主力会

师,碑身下部浮雕8组代表中国革命胜利的图案。

“将台堡会师纪念碑,是最晚落成的长征纪念碑,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。”张馆长说,纪念碑是1996年10月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修建的。

## 会师之前的激烈战斗

将台堡会师是怎样一个经过?多少年来由于宣传较少,了解的人并不很多。

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黄新廷当年参加过会师,他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十二团团长,解放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司令员,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。他在回忆文章中说,10月20日傍晚,他们到达六盘山南山脚下,正值深秋,树木落叶,花草凋零。他们准备从山脚下绕过去,正行进间,突然遇上了马鸿宾的骑兵,敌人从附近的山头上朝他们疯狂地扑来。前卫营营长蔡久一面派人向团里报告敌情,一面指挥部队阻击敌人。他立即命令三营去支援二营,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,保证军团主力顺利通过六盘山。经过激烈的战斗,他们打退敌人的进攻,占领了一个小村庄,控制了山下的大道。大西北深秋的夜晚,寒气袭人,那时他们身上还穿着一年前的单衣,冻得直打颤。黎明前,敌人约两个团的兵力,在炮火掩护下冲过来,当敌人接近阵地前沿时,战士们一起开火,再加上一阵手榴弹,打得敌人倒下一片。随后红军战士像猛虎似的发起了冲锋,把敌人压到一条沟边去。正当他们准备把敌人全部歼灭时,敌人的飞机突然飞临上空,疯狂地扫射、轰炸,红军只好迅速疏散隐蔽,逐步撤出战斗。

上午,部队正在转移,却又遇到了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。红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,集中火力,打得敌人弃尸而逃。之后,他们接到通知,主力部队已于当天顺利通过六盘山,向北转移了。

## 总书记将台堡缅怀先烈

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另一个重要节点,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》和军事科学院编著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》等都将红一、四方面军的会师和会师后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,在党史、军史上给予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,并把这两次会师的实现作为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。

1996年10月22日,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,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,其中讲到:“六十年前,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,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,在会师和将台堡胜利会师。”这是对将台堡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。

2016年夏天,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将台堡,他说,长征永远在路上。这次专程来这里,就是缅怀先烈、不忘初心,走新的长征路。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两个月后,记者在将台堡采访时,很多当地人津津乐道习近平总书记来时的情况。(据《兰州晚报》)

# 十万浙江青年支援宁夏(三)

支宁带队干部 汪智泉

## 先进

六十年来,在自治区党委领导关怀下,浙江支宁人员在各条战线上,辛勤工作、艰苦创业,将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宁夏地区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建设。为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,大批支宁人员受到自治区党委和政府、国家部委的表彰奖励,他们中事迹特别突出的如:在农垦战线上,连续五年被农场评为先进生产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劳动模范、荣获农垦部劳模奖章和证书的江再林;在教育战线上,无私奉献、银川市特级教师章健(女);在医疗卫生战线上,著

## 回乡

浙江支宁人员来到宁夏,正赶上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,全区群众生活实行“低标准,瓜菜代”,粮食严重减产,职工口粮从每月30斤降到25斤,单身的支宁青年,没有任何积蓄,又积极分子”奖章王月明;在商业战线上,为宁夏发展经济成绩显著、荣获自治区、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称号的程宁;在金融战线上,积极支持企业发展、银川市先进工作者李君庆;在扎根固原山区中,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积极贡献、荣获国家《边疆优秀儿女》光荣称号的陶国琪。他们的先进事迹,为国家争了光、为浙江人民争了光。

动”,一些支宁人员被错捕、错判,使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,从1960年冬到1961年底大批支宁人员纷纷离开宁夏返回浙江。

因自治区刚成立,物质基础薄弱,粮食住房严重不足,没有能力接收大批支宁人员,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问题,经研究,对支宁人员采用放长假、回乡探亲的办法,由个人申请、单位批准,补助路费,自带口粮关系,有组织批准送回原籍,最后坚持留在宁夏的只有万余人。

支宁人员在宁夏已奋斗了六十年来,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无私奉献给宁夏,我们要告诉子孙后代,不能忘记这种精神,为建设美丽的宁夏继续作出贡献。

# 土瘠野旷好屯田

宁夏在古代地居边陲,地广人稀,虽有秦汉、北魏、唐和西夏几个时期的移民开发,但是也历经各朝代的治乱兴衰,因而直到元初,仍然有许多荒地没有得到利用。

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,便于公元1264年派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中兴、西夏等路,同行的还有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。他们到宁夏后,公布告示安定人心,发动军民疏通了唐徕、汉延、秦家等几条大渠和70余条灌溉支渠,使9万多顷土地得到了灌溉。郭守敬还对今银川川内蒙古东胜一段的黄河进行了勘察,向忽必烈提出:从中兴(宁夏银川)至东胜(今内蒙古)可通漕运的建议。当时忽必烈对宁夏地区的军事屯田也十分重视,曾下令迁来大批军队在此垦荒。原西夏国相斡道冲的孙子朵儿赤看到中

兴、西夏等地“土瘠野旷,十不耕一”,就建议忽必烈屯垦,他毛遂自荐担任南军总管,负责筹划这一地区的屯田事宜。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朵儿赤任职后,将南军中身强力壮的人挑选出来进行垦田,堵塞修整了许多影响屯耕的黄河岔流沟渠。三年之后,收成大增。忽必烈在位时多次把湖北等地的居民和俘虏的南宋军人迁往中兴、开城一带屯田。据史料记载,前后地区仅政府各类屯田便有五千四百多顷。

也就是在元代,“宁夏”这一名称见于世。蒙古灭亡西夏以后,在较长一段时期,今宁夏平原地区仍沿用旧称西夏、中兴,直到至元二十二年(即公元1285年),才设立“宁夏行中书省”。宁夏作为省级的建制始于元代,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。(据新华网)